

论身体视角下的文学史书写

卢 絮

(华南师范大学 国际商学院, 广东 佛山 528200)

摘要: 伴随着西方现代性的发展,身体成为人们思考自身和世界的出发点。身体时刻都在参与文学的发展,从身体的视角来研究文学和探寻文学史演进的轨迹是可行且应当的。以身体为基点的个人叙事,可以弥补和整合宏大叙事难以顾及的细碎的、边缘的因素,发现新的文学现象;身体与世界互为主体,它是个体与世界的纽带,总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言说生命意义。将身体视角介入文学史书写,既可以让我们感受文学作品中多样化的身体现象,领略文学主体与世界的对话,也可以从文学中身体的境遇勘察社会政治、历史、文化的变迁。

关键词: 身体;文学史;自律论;他律论

中图分类号: I0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7192(2015)04-0065-05

自上世纪初开始,“身体解放”就成为西方现代性进程中的重要议题。感性身体开始取代理性逻辑,超越性本体被解除,人从精神的集体存在回归个体生存,身体成为个体价值呈现的基点。英国学者伊格尔顿曾说,“现代化时期的三个最伟大的美学家——马克思、尼采和弗洛伊德——所大胆开始的正是这样一个工程:马克思通过劳动的身体,尼采通过作为权力的身体,弗洛伊德通过欲望的身体来从事这项工程”^[1]。可以说,20世纪的西方现代性历程是从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美学、语言学、文学等各个领域向身体全面“进攻”的历程,身体研究成为显学,成为理解当代社会和文化不可或缺视角。

一、身体研究的兴起及其启示

身心问题是困扰人类思考自身存在的最基本的哲学命题之一。在中国,身体一直都是被贬低的对象,老子说:“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身体成为个人忧患甚至国家忧患的根源;儒家则要求君子“以礼正身”,“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身体需要用“礼”,即道德伦理来规范,为了成就“仁”和“义”,可以不惜灭绝身体;封建时代的身体更是被仁义道德的外衣层层包裹,甚至被摧残和扭曲,古代女子的裹脚便是一例。传统的西方社会同

样如此,柏拉图相信只有身体的欲望被抑制,灵魂才能活跃,身体是灵魂抵达理念世界的障碍,是人类通往智慧之路的累赘。笛卡尔的名言“我思故我在”明确指出只有人的理性思维才能证明人的存在,笛卡尔要求人们摒弃对身体的依赖而仰仗人的理性思考来追求真理。近代哲学家康德和黑格尔虽然确立了人的主体性地位,肯定了人对世界的主导权,但是身体依然是被忽视的,从前者的“三大批判”或后者的“绝对意志”中,我们看不到身体的影子,灵魂或理性却依旧在高空飞扬。

自尼采开始,身体逐渐显现它的重要性,尼采的名言“以身体为准绳”说的就是万事万物要凭借身体来衡量,身体是一切事实的评价基础。他还说:“肯定对肉体的信仰,胜于肯定对精神的信仰”^[2]。肉体第一次站在了精神的上方,受到了认可。20世纪以来,沿着尼采的肉身之道,福柯、萨特、梅洛·庞蒂、德勒兹、布尔迪厄、鲍德里亚等人对身体的研究更为深入和宽广。如福柯从社会政治学的角度考察了身体在历史上的变迁以及身体同权力的角逐,他发现权力在不断地摧毁身体,而身体恰恰反映了这种历史的痕迹,历史存在于身体的表面。梅洛·庞蒂从现象学的角度认为:“身体是在世界上存在的媒介物,拥有一个身体,对一个生物来说就是介入一个确定的环境,参与某些计划和继续置身于其

收稿日期: 2015-04-13

基金项目: 华南师范大学青年教师科研培育基金资助项目(14SK10)

作者简介: 卢 絮(1979-),女,华南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文艺理论、文化研究。E-mail:stinaluxu@163.com

中……我通过我的身体意识到世界”^[3]身体被摆在了自我和世界的交汇点,世界不再呈现在人的意识之中,而是和身体打交道,通过身体证明其存在;身体不再是人头脑中的客观认识对象,它成了言说的主体,是意义的产生基点。鲍德里亚认为消费社会中的身体早已远离现代性身体解放的初衷和愿望,身体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神话,它遵循着资本主义追逐利润的原则,形成新的身体奴役和身体暴力。

身体研究的兴起是现代性发展的必然要求,个性解放和个体价值的被重新发现和挖掘让我们对于自身身体无法回避。笔者认为现代性的身体概念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生物学或医学意义上的血肉之躯,即肉体,或称形体;二是人类从“神”到“人”的自我认识的回归,是有充分个体特征的生命实体;三作为“话语的身体”,它与社会、时代、政治、经济、文化、权力纠缠,是可以被修饰甚至改造的身体形态;四是成为意义主体的身体,是一种具有意向性的能够产生意义和言说自身的主体性存在。从这几点出发来理解和阐释文学中的身体现象,我们会有新的收获。因为文学首先是“人学”,人的参与就意味着身体的参与,从文学的创作、接受、阐释和传播过程中身体的直接或间接介入,到存在于文本中世代流传下来的、经久不衰的身体现象,以及这些真实的或虚拟的身体背后所隐含和潜伏着的社会、文化、政治内涵等都值得我们回味和思考。具体来说,就是作家为何以及如何通过身体进行言说;读者和评论家们为何以及如何解读、接受或阐释文学作品里的身体现象;身体以何种姿态以及为何以此种姿态出现在文学史上,并参与文学史的构建;文学的发展又给予了现实生活中真实存在的身体以何种启示和力量,让人找回自我、回到生命的源头,尊重个体生命的存在和价值。这些问题不仅可以打开研究者的视域、拓宽文学研究的领地,还可能让我们重回被历史遗忘的角落,恢复一些珍贵的文学记忆。

二、文学史书写中身体的不在场

文学来自视为纯精神领域的产品,是人类思想和灵魂的栖息之所,对身体采取回避或忽视的态度,所以纵观文学史研究历程,身体几乎是缺席的。谢有顺的话不无道理:“我们的文学,还停留在对

文化、社会、精神的想象上,对于身体本身的想象几乎还是空白”^[4]。

从历时的角度看文学史发展,有两条重要的线索,一是具有悠久传统的他律论模式,二是历时较短的自律论模式。前者往往强调文学对社会政治、经济、历史、意识形态的依赖,它们的变化能直接地影响和决定文学的发展。在西方,斯达尔夫人(Madame de Stael)开启了文学与社会关系研究的先河,她考察地理因素和气候、民族心理等对于文学的影响,重视民族和时代的普遍精神而忽略作家的个人性格;之后,泰纳(Adolphe Taine)提出文学发展三要素——种族、时代、环境;勃兰兑斯力图通过心理沟通作家、作品和社会;普列汉诺夫提出经济关系决定论,将文学发展的最终动力归结为社会经济关系和生产力状况。在中国,自古有“文以载道”的传统,文学与政治的联姻亘古有之。如很多中国古代杰出的文学家同时又是杰出的政治家,文章之事被称为“经国之大业”,“立言”与“立功”、“立德”同是“不朽之盛事”。这种情况在上世纪中期的中国愈演愈烈,“文艺为政治服务”成为文学创作的口号和评价的标准,文学完全沦为政治活动的手段和工具。陶东风认为他律论文学史观“以社会学的评价和尺度代替了审美的评价和尺度”^[5]。的确,无论是社会决定论还是政治决定论,都忽略了文学的基本属性,即文学性;忽略了文学主体的创造性和个性,过分强调社会、政治等外部因素对文学的干预。如韦勒克所言:“文学被认为完全由一个国家的政治或社会革命所决定”^[6]。文学史成了政治史或经济史的附庸,失去了独立存在的合法性。在这样的文学史模式中,文学中的身体只有两种处境,要么被有意回避和隐藏,要么成为宣扬政治意识形态的工具;身体不再属于个人,而是属于统治者、集体或者国家;它不是具有本体论意义上的个人身体,而成了一种象征着权力和占有的身体隐喻。

文学史自律论是20世纪初人文学科出现的“语言学转向”的产物,对语言本身的兴趣使研究者们开始关注文学文本,从文学作品内部来探寻文学发展的规律和轨迹。主要代表是俄国形式主义文学史理论、新批评和结构主义文学史观。自律论认为文学的发展是自我生成和转化的,文学的形式、规范

等交替兴衰，韦勒克认为：“这些规范、标准和惯例的被采用、传播、变化、综合以及消失是能够加以探索的”^[6]。自律论者对审美和文学性的强调，恰恰是对于过去文学史中过分政治性和意识形态化的反拨。然而这种文学史观把文学形式之外的东西都予以排除，使文学成了存在于真空中的物质，它与社会现实的血肉联系被割裂，其反映现实和社会批判的功能被忽略。譬如 80 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研究就立足于把文学从政治的依附中摆脱出来，呼唤文学本体的回归。文学创作的内在规律得到尊重，以审美为中心评价机制也成为中国文学史书写的新现象。然而，也许当文学失去了评判现实的能力，躲进象牙塔享起了清福之时，也是到了文学退出人们视线，被人们所遗忘的时候。文学自律论的兴起使文学从政治、历史的干预中独立出来，所谓从文学外部回到了文学内部，是一种文学主体性的回归。但是这种主体只是文学文本或语言，而文学真正的主体应该是个人，是活的生命体，是身体。因此，身体继续躲在文学的背后沉默不语。

上文两种主要的文学史模式源自机械的二元对立的思维，通常以一方压倒另一方来获得存在的依据。这样的文学史观是一种内向性封闭结构，不具备包容、对话和开放的特点，也没有持续发展的动力和生命力。张荣翼认为：“文学史研究上的各种线索观，其实都是依循着一种假定来概括文学演变过程，找出一种普遍性的规律，但是实际的文学史线索可能千头万绪，并不就范于一个简单的模式”^[7]。的确，任何单一的模式都难以解释全部文学史现象，例如当政治不再成为文学价值评判的唯一尺度，审美就可以充当么？当审美成了唯一标准，那么文学的社会批判性、文学与现实的关系从何处体现？此外，上文提到的两种文学史研究模式有一个重要的共性，那就是我们见不到身体的影子，身体要么被政治、意识形态排斥，要么被审美、文学性遮蔽。

文学史研究中身体的缺席其实质是文学主体和个体生命的缺席，没有身体参与的文学史是没有主体和生命的文学史。豪塞尔曾说：“在历史中唯一可见的行动者就是个人，人们的确能够把社会当作是历史事件的真正的摇篮，……但不能否认思想和活动的职能只属于单个的人”^[8]。如果承认文学

史的构成是个人作为主体参与的过程，文学史由人书写，那么也就肯定了身体在文学史建构中的重要地位和价值。因为身体是属于个人的，人通过身体感知世界，与世界沟通，而世界即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变化也通过身体的不断变迁体现出来。从身体出发来研究文学，追溯文学创作、欣赏的内在线索和途径，以及由此窥探历史社会发展的进程是可行且应该的，它可以超越他律或自律论两种相互对立的文学史线索观，回归文学主体和文学中的个体生命。陶东风说：“文学史绝不仅仅是遗留至今的死的材料，它固然是过去，但这过去曾经而且仍然充满了生命，研究文学史首先就是重构这种过去的生命”^{[5][16]}。文学中存在的活生生的、有痛苦、欢乐、欲望和思想的身体现象即是生命现象，文学史书写实质是一种生命书写，而文学真正的本体回归就是要回归身体。

三、文学史研究中身体视角的意义

如前文所说，随着西方现代性工程的开展和“身体解放”运动的影响，个体生存方式从高高在上的精神层面回归日常生活的实践层面，人们从关注“神”到关注“人”和自我本身，身体成为言说主体和被言说的对象；社会学和人类学等人文学科对身体的强调和研究的丰富成果也使文学中的身体研究有了借鉴的对象和丰富的理论来源。笔者认为文学史研究中的身体视角有以下几点价值：

其一、身体处于自我和世界的交汇点，是联系自我和世界的桥梁。就如奥尼尔所说：“我们的身体就是社会的肉身”^[9]从身体出发，我们既可以感受作家作品的独特审美个性，领略审美主体与世界对话，也可以从文学中身体的不断变迁勘察社会政治、历史、文化的变迁。中国文学史上身体的境遇和变迁最能说明这个问题：从先秦文学中自由、伸展的身体到封建社会中变异、扭曲的身体；从五四文学中觉醒、反抗的身体到革命文学中激情、战斗的身体，从文革中静默、集体化的身体到消费社会里成为了商品的、市场化的身体，身体的每一次变迁，它在不同时代的文学中的不同境遇不仅能帮助我们厘定文学史演变的线索，也能让我们更好地获悉当时社会、政治、历史发展变化的状况。

其二、以身体为基点进行个人叙事，即从个人

身体出发的小叙事中寻找文学发生的偶然性且关键性因素。这是对传统整体性宏观叙事的反拨,可以弥补和整合宏大叙事难以顾及的细碎的、边缘的因素,发现新的东西,补充和完善已有的文学史书写。例如我们对《红楼梦》的权威解读里少不了一条就是:作者曹雪芹试图通过描写一个封建大家族的没落故事来揭示封建制度必然灭亡的命运。且不考证作者是否真的有那么大的宏图伟志,就从小说开篇第一回的诗句:“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中,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作者“涕泪飘零”的身体现象,作家的个人生命体验以身体的在场为前提,身体的直觉反应能够真实而丰富地表现作者的内心世界。这一部用身体书写的饱含着曹雪芹辛酸之泪的作品,同样需要读者身体的参与去“体味”其中的深意。

其三、身体的个体化本质能帮助我们发现个人与时代、审美与政治等因素之间的复杂纠葛关系。譬如上世纪20、30年代,伴随着中国大地上此起彼伏、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出现在文学里的主要症候是充满着使命感和责任感的革命激情与高举着“恋爱自由”和“个体解放”的浪漫爱情。“革命”是属于时代的,而“恋爱”是属于身体和个人的,在这种“革命加恋爱”的模式里,我们看到了一个个鲜活的身体如何凭借自身的力量来应对革命运动的潮流:如矛盾《蚀》与《虹》里年轻男女们在革命与恋爱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情绪纠结,《幻灭》里女主角们时而追求革命,时而追求爱情的辗转反复,他们怀抱着“献身革命”的战斗热情,同时也在身体的爱欲或享乐中徘徊。如王德威所说:“在历史与虚构、欲望与实践、个人与社会等二元领域,寻找相互交会龃龉的界面,从而引起此起彼落的抗辩交谈声音,也许是我们应努力的方向”^[10]。身体视角的介入不失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之一。

其四、身体是意义发生的场所,梅洛·庞蒂说:“身体把该意义投射到它周围的物质环境和传递给其他具体化的主体。”^{[3]230-231}意思是身体不再是封闭的客体,它作为独立主体与世界发生联系,并产生意义。文学中的身体不仅是所见的,还是能见的;它注视着一切,同时也注视着自身;它总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言说意义。如在《狂人日记》里,鲁迅用“吃人”和“被吃”这两种极端的身体行为

言说着中国历史的苦难,人的身体降格为动物的兽性身体,身体的相互摧残表征着世界的疯狂与混乱,隐含着作者对人世的基本态度。以觉醒者出现的狂人后来发现自己的身体也参与其中,成了“吃人”历史的书写者之一,这说明身体的苦难和罪恶不仅来源于身体之外,同样来自身体本身。这种关于身体的宿命论也使得作者最后发出的“救救孩子”的呼声显得那么悲怆和令人绝望。

四、结 语

自从身体摆脱灵魂和理性的压制,它就以独立的主体性存在启发我们对于自身和世界的思考。文学中的身体可以帮助我们观察世界,探寻社会、文化、历史、意识形态发展变化,我们也可从文学中观察身体的境遇,了解生命的生存方式和存在价值。身体总在以一种隐匿或直接的方式述说着人与世界的调和或冲突:人通过身体表达对世界的看法,世界也通过各种方式不断影响和建构着人的身体,身体是一个历史实践的过程,它在创造和推动历史发展的同时也在塑造和改变自身。文学史中身体问题的引入可提供一种新的文学研究视角,拓宽文学研究领域,力图找到文学性、审美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平衡。

参 考 文 献

- [1] (英)特里·伊格尔顿. 审美意识形态[M]. 王杰,等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192.
- [2] (德)尼采. 权力意志: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M]. 张念东, 凌素心,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178.
- [3] (法)梅洛·庞蒂. 知觉现象学[M]. 姜志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116,230-231.
- [4] 谢有顺. [eb/ol].[2015-04-15].http://blog.sina.com.cn/s/blog_59380f5001000150.html,2011/12/13.
- [5] 陶东风. 文学史哲学[M].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4:13,16.
- [6] (美)韦勒克,沃伦. 文学理论[M]. 北京:三联书店,1984: 33,306.
- [7] 张荣翼. 关于两种文学史线索观的思考[J]. 江海学刊, 2005(1):186.
- [8] (美)豪塞尔. 艺术史的哲学[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191.
- [9] (美)奥尼尔. 身体形态:现代社会的五种身体[M]. 张旭春, 译. 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17.

(下转第86页)